

文明的衝突？

◎ 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下一種衝突模式

世界政治正進入新階段，學者紛紛預測它的形態——歷史的終結、民族國家恢復傳統的競爭、民族國家在部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的張力下衰落等等。這些看法各自反映了現實的一面，但全都不能抓到未來國際政治最重要、最核心的問題。

我認為新世界的衝突根源，將不再側重於意識形態或經濟，而文化將是截然分隔人類和引起衝突的主要根源。在世界事務中，民族國家仍會舉足輕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衝突將發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間。文明的衝突將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間的斷層線將成為未來的戰鬥線。

文明的衝突是近代世界衝突演化的最新階段。由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產生的近代國際制度出現後一個半世紀，西方世界的衝突大部分發生在君主之間，也就是說，在試圖擴張其官僚機構、軍隊、商業經濟力量 and 最重要是領土的帝王、獨裁君主和立憲君主之間。在這過程中出現了民族國家。自法國大革命開始，衝突主線就從君主轉移到民族國家之間了。巴爾麥(R.R. Palmer)指出，從1793年起，「君主的戰爭已經完結，人民戰爭剛開始」。這種十九世紀的模式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然後，由於俄國革命及其引起的反應，國家的衝突讓位於意識形態的衝突。先是共產主義、法西斯—納粹主義以及自由民主政體之間的衝突，後是共產主義與自由民主政體之間的衝突。冷戰期間，後者體現為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角力。在歐洲傳統中，它們都不是民族國家，而是認同於各自的意識形態的。

君主、民族國家、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基本上是西方文明的內部衝突，即

* 本文經獲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授予中文獨家版權，所有轉載、節錄或引用，均需先獲得本刊書面同意。

新世界的衝突根源，將不再側重於意識形態或經濟，而文化將是截然分隔人類和引起衝突的主要根源。全球政治的主要衝突將發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間。

林特(William Lind)所謂「西方的內戰」。這說法對冷戰，對兩次世界大戰，乃至對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早期戰爭來說，都同樣適用上。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已邁出西方階段，重心轉到西方與非西方文明，以及非西方文明彼此間的相互作用上。在涉及文明的政治中，非西方文明不再是西方殖民主義下的歷史客體，而像西方一樣成為推動、塑造歷史的力量。

文明的本質

冷戰期間，世界分為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現已沒有太大意義。現在以文化和文明來區分國家，要比以政治、經濟體制或者經濟發展水平來區分，更有意義得多。

所謂文明到底是甚麼意思？文明是一個文化單位。鄉村、區域、族群、民族、教派等等，都各有殊別的文化 and 不同程度的內部文化差異。意大利南部村莊的文化可能與北部村莊不同，但它們同屬與德國村莊有別的意大利文化。歐洲社區共有的文化形態，則使它們與阿拉伯或中國社區分別開來。可是，阿拉伯、中國和西方並非更高層的文化，而是各別構成了文明。因此，文明是人類文化最高層次的組合，也是人類文化認同的最廣領域：再要推廣就是人類與禽獸的分別了。它一方面由語言、歷史、宗教、風俗、制度等共同客觀因素決定，另一方面也有個人主觀認同的因素。認同可以有許多不同層次：一個羅馬居民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自認為是羅馬人、意大利人、天主教徒、基督徒、歐洲人或西方人，而他所屬的文明則是自我認同的最寬廣層次。由於人可以而且實際上會改變認同，因此文明的從屬分子與界限也會有變。

文明可能涉及一大群人，例如中國(白魯恂Lucian Pye所謂「一個以國家自居的文明」)：或者一小撮人，例如說英語的加勒比海人。文明可能包含幾個民族國家，例如西方、拉丁美洲與阿拉伯文明：或者一個國家，例如日本文明。文明顯然會混合和相疊，亦可能包含許多子文明。西方文明包含歐洲和北美洲，伊斯蘭文明則有阿拉伯、土耳其語族和馬來語族。然而，這些皆無礙文明之為有意義的實體：文明間的分界儘管模糊，但它還是真實的。文明是動態的：它們有興有衰、有分有合。讀歷史的人都知道，文明也會被時間埋葬。

西方人總認為民族國家是國際政治的要角，可是這狀況只維持了幾個世紀。長遠來說，人類歷史的主線還是文明。湯因比(Arnold Toynbee)在《歷史研究》裏提到二十一種主要文明，但存留至今的只有六種而已。

為何文明會衝突

文明的認同在未來日益重要，世界形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七、八種主要文

明的互動：它們包括西方、儒家、日本、伊斯蘭、印度教、斯拉夫—東正教、拉丁美洲，亦可能包含非洲文明等。未來最重要的衝突將發生在文明間的斷層線上。

為甚麼會這樣呢？

第一，文明的相異不單真實而且基本。文明被歷史、語言、文化、傳統，更重要的是被宗教所區隔。不同文明對上帝與人、個體與群體、公民與國家、父母與子女、丈夫與妻子的種種關係有不同的觀點，而對權利與責任、自由與權威、平等與階級的相對重要性亦有迥異的看法。這些差異在歷史上產生，不會立即消失，且比政治意識形態及政權的差異更為基本。差異不一定意味衝突，衝突亦不一定隱含暴力，但長久以來，由此引起的衝突往往最持久、最暴虐。

第二，世界的距離拉得愈來愈近。民族間的互動日趨頻繁，一方面加強了文明意識，另一方面亦加強彼此的差異性與內部的共通性。北非人移居法國引起法國人的敵視情緒，亦因此強化了法國人對「善良的」歐洲天主教波蘭移民的接受力。美國人對日本人投資的負面反應，遠超過加拿大及歐洲。何羅維策(Donald Horowitz)指出：「在尼日利亞東部地區的伊博人可能是……奧華利或安尼沙的伊博人。在拉各斯他是伊博人，在倫敦卻是尼日利亞人，在紐約則是非洲人。」民族間的互動，強化他們的文明意識，亦由此激發彼此的差異和仇恨，而這些差異與仇恨往往源自歷史的深處。

第三，全球經濟現代化與社會轉型的歷程，一方面使人超越長期以來的本土認同，而另一方面民族國家不再是認同的唯一來源。世界大多數地方，宗教都以原教旨運動形式填塞這個真空，它可見諸西方的基督宗教、猶太教、佛教及印度教甚或是伊斯蘭教。在大多數國家及宗教裏，活躍於原教旨運動的，往往是年輕且受大專教育的中產階級技師、專業人員和商人。韋格爾(George Weigel)曾說：「全球非世俗化過程是二十世紀末一個突出的社會事實。」宗教復興——革培爾(Gilles Kepal)所謂「上帝的報復」(la revanche de Dieu)——提供了認同與委身的基礎，它超越國界且凝聚不同文明。

第四，西方的雙重角色加強文明意識的增長。一方面，西方正處於權力高峰，但與此同時(又或許是前者的結果)，又可以看到非西方文化正出現回歸根源的現象。愈來愈多人談及有關日本內轉並「亞洲化」的趨勢：尼赫魯政權結束與印度的「印度教化」；西方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破產，引致中東「再次皈依伊斯蘭」；而俄羅斯則有西化與俄羅斯化的激辯。西方雖處於權力高峰，卻正面對非西方世界以更強烈的慾望、更堅強的意志及更充沛的資源來決定世界的未來。

過去，非西方社會精英通常與西方有深厚淵源，他們在牛津、巴黎大學索邦分校或英國陸軍軍官學校受教育，汲取西方的處事方式和價值，但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普羅大眾仍深受固有文化影響。可是，這種情況現在倒轉了：精英分子的非西方化與本土化正在展開，相反，西方(通常是美國)文化、作風

文明的差異在歷史上產生，不會立即消失，且比政治意識形態及政權的差異更為基本。長久以來，由此引起的衝突往往最持久、最暴虐。

與習慣卻在大眾中愈來愈普及。

第五，文化的特質與差異較在政治及經濟上的更難改變，也更不容易妥協與解決。在前蘇聯，共產主義者可以變成民主主義者，貧富亦可易位。可是，俄羅斯人卻不能變成愛沙尼亞人，阿塞拜疆人亦不能變為亞美尼亞人。就階級與意識形態衝突言，關鍵問題是：「你到底站在哪一方？」人們可以，並且事實上會選擇並改變立場。而文化衝突的問題則在：「你是甚麼？」但這是既定且不能改變的。眾所周知，從波斯尼亞到高加索到蘇丹，錯誤的答案可能連性命也賠上。宗教歧視比種族問題更為尖刻與排他。一個人可以擁有法國與阿拉伯的血統，或同時是兩國公民，但他卻不能既是天主教徒又是回教徒。

最後，經濟區域主義日益抬頭。1980—89年間，各區域內總體貿易比率有上升的趨勢。歐洲由51%上升至59%，東亞由33%上升至37%，而北美則由32%上升至36%。區域性經濟集團在未來的重要性可能會增加。成功的經濟區域主義一方面增強了文明意識；另一方面，只有當經濟區域主義植根於共同的文明中才能成功。歐洲共同體以歐洲文化及西方基督宗教為共同基礎。北美自由貿易區能否成功，端視刻下正進行匯合的墨西哥、加拿大及美國文化。相比之下，日本因為是個獨特的社會與文明，所以它在東亞創設一個類似的經濟實體時就面臨許多困難。不管日本與其他東亞國家發展的貿易與投資聯繫網絡如何增強，而文化的差異卻抑制甚或阻斷了日本倡導像歐洲及北美的區域性經濟整合。

相形之下，共同文化顯然促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台灣、星加坡及其他亞洲國家的華人社會在經濟關係上的急速擴張。冷戰結束後，文化共同性逐漸克服了意識形態的差異，中國大陸與台灣亦較以前走得更为接近。如果文化的共同性是經濟整合的先決條件，那麼未來最主要的東亞經濟集團很可能會以中國為中心。事實上，這集團早已存在。正如韋登鮑姆(Murray Weidenbaum)所見^①：

儘管日本目前在亞洲區域居主導地位，但以中國人為主的亞洲經濟正急速崛起為新的工商業、金融的強有力中心。這個戰略性地區具有相當大的科技與生產能力(台灣)；卓越的企業、行銷及服務頭腦(香港)；良好的通訊網絡(星加坡)；龐大的金融資本結集(以上三地)，以及可供使用的廣袤土地、資源與勞動力(中國大陸)……從廣州到星加坡、從吉隆坡到馬尼拉，這個受傳統宗族精神牽引而深具影響力的網絡，被視為東亞經濟的脊梁。

文化與宗教亦構成經濟合作組織的基礎，這個組織將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薩克、吉爾吉斯、土庫曼、塔吉克、烏茲別克及阿富汗等十個非阿拉伯穆斯林國家凝聚一起。由於部分國家領袖得悉無法獲准加入歐洲共同體，促使這個由土耳其、巴基斯坦及伊朗於60年代創立的組織得以復興與擴展。同樣的，加勒比海共同市場、中美洲共同市場與南美洲的南方共同市

區域性經濟集團在未來的重要性可能會增加。成功的經濟區域主義一方面增強了文明意識；另一方面，只有當經濟區域主義植根於共同的文明中才能成功。

場亦各自以共同文化為基礎。企圖建立更廣闊的加勒比海—中美洲經濟實體，彌合盎格魯系統與拉丁系統的努力至今仍是失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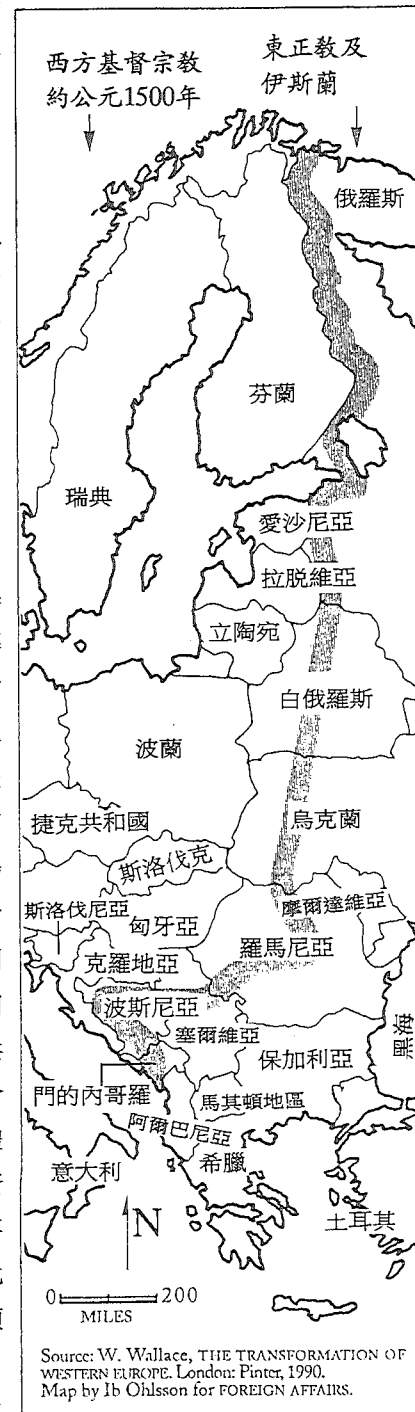
由於人們以種族及宗教來界定自己的身分，因而往往認為在他們與不同種族或宗教的人之間，存在一種「我們」與「他們」的對立關係。由於東歐及前蘇聯境內藉意識形態來界定的國家相繼解體，傳統的種族身份認同及種族仇視伺機抬頭。文化與宗教的差異亦令政策分歧：從人權、移民到貿易；由商業到環境等等不一而足。地理上的毗鄰觸發了從波斯尼亞到明達瑙島的領土糾紛。最重要的是，西方倡議民主與自由主義為普遍價值，維持其軍事優勢與促進其經濟利益的種種努力，最終激起其他文明的負面反應。政府與集團愈不能用意識形態來尋找支持與結盟，它便愈發訴諸共同信仰與文明認同來達致這些目的。

因而，可以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次觀察文明的衝突。在微觀層次來說，不同文明間斷層線上的鄰接集團，常常為領土及控制權而鬥爭（這些鬥爭通常以暴虐方式出現）。在宏觀層次上，文明相異的國家為了相關的軍事與經濟力量而競逐，為了爭奪國際組織及第三勢力的控制而鬥爭，亦為了倡議各別的政治及宗教價值而互相角力。

文明間的斷層線

文明間的斷層線取代冷戰期的政治及意識形態界限，成為危機及流血的爆發點。冷戰始於鐵幕從政治上與意識形態上把歐洲分隔的時候，它亦隨着鐵幕的終結而結束。歐洲的意識形態分界已經消失，但文化分界則再次浮現：一方面是西方的基督宗教，另一方面是東正教與伊斯蘭教。華萊士(William Wallace)指出：歐洲最重要的分界線大概是公元1500年西方基督宗教的東部邊界。這條線沿着今日芬蘭與俄羅斯以及波羅的海諸國與俄羅斯邊境延伸，而貫穿白俄羅斯與烏克蘭境內，將以天主教為主的烏克蘭西部與以東正教為主的烏克蘭東部分開，向西轉移把特蘭西瓦尼亞從整個羅馬尼亞分隔出來，然後約沿着現今克羅地亞、斯洛伐尼亞與南斯拉夫其他地方的分界線而穿過南斯拉夫國境。在巴爾干半島，這條線跟歷史上哈普斯堡帝國與奧圖曼帝國之間的邊境相符。這條線的北邊及西邊的民族不是新教徒便是天主教徒，具有歐洲歷史的共同經驗：封建時期、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等。他們的經濟境況一般較東部民族為好，有機會進一步參予歐洲共同經濟體系，並鞏固民主政治制度。而此界線東部與南部的民族不是東正教徒便是伊斯蘭教徒，歷史上屬於奧圖曼或沙俄帝國，他們很少受歐洲其他地方發生的重要事件影響。一般來說，他們經濟較落後，亦難發展穩定的民主政治制度。文化的絨幕取代意識形態的鐵幕而成為歐洲最重要的分界線。當前南斯拉夫事態顯示，這條界線不單是文化差異的界線，有些時候亦是血腥的衝突線。

在西方與伊斯蘭文明斷層線上發生的衝突持續了一千三百年。伊斯蘭創立



後，阿拉伯人與摩爾人向西方與北方挺進，直至公元732年於都爾才告結束。十一至十三世紀，十字軍試圖把基督教及其教規帶至聖地，獲得了短暫的成功。十四至十七世紀，奧圖曼突厥人扭轉局勢，將勢力延伸至中東及巴爾干半島，攻陷君士坦丁堡，並兩度圍攻維也納。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早期，奧圖曼勢力衰落，英國、法國及意大利在北非與中東建立起西方勢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開始撤離，殖民帝國消失；阿拉伯民族主義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相繼湧現；西方高度倚賴波斯灣國家所提供的能源；石油產量豐沃的穆斯林國家變得財富豐厚，而且只要他們願意，亦可使武器裝備變得更為精良與充足。由西方策動，阿拉伯與以色列發生了幾場戰爭。法國在阿爾及利亞進行的一場血腥與殘暴的戰爭幾乎延及整個50年代；1956年英國與法國軍隊入侵埃及；1958年美國軍隊進佔黎巴嫩；其後美國軍隊返回黎巴嫩，攻佔利比亞並與伊朗發生多次軍事衝突；至少由三個中東政府支持的阿拉伯及伊斯蘭恐怖分子，使用劣質武器轟炸西方飛機與設施，並挾持西方人質。當1990年美國派遣強大軍隊至波斯灣保衛某些阿拉伯國家免受其他國家侵略時，阿拉伯與西方之間的戰爭衝突亦跟着升級到頂點。其後果是北約組織的計劃愈來愈針對「南部接壤地區」潛在的威脅與動盪。

西方與伊斯蘭國家這種超過一世紀的軍事交鋒似乎還沒有稍減的跡象，反而愈演愈烈。侯賽因(Saddam Hussein)在海灣戰爭襲擊以色列並敢與西方對抗的行為，使某些阿拉伯人引以為傲。但他們亦因西方在波斯灣展現的軍力、壓倒性的軍事優勢，以及為着無力塑造自己的命運而感到羞辱與憤慨。石油輸出國及許多阿拉伯國家已達到一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獨裁政府的形式已不合時宜，引介民主政治的努力則愈形殷切。阿拉伯政治制度的空場已然出現。但在阿拉伯世界裏，西方式民主反而強化了反西方的政治力量。這也許只是個短暫現象，但它肯定會把伊斯蘭國家與西方之間的關係變得更為錯綜複雜。

人口問題亦增加了這些關係的複雜性。阿拉伯國家驚人的人口增長(特別在北非)，引致遷往西歐的人口遽增。西歐撤減內部疆界的趨勢，銳化了對這種事態發展的政治敏感度。在意大利、法國及德國，種族主義日漸公開，自1990年以來，對阿拉伯及土耳其移民的政治反彈與暴力手段愈演愈烈，亦日益蔓延。

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世界各自都將他們的關係視為文明的衝突。據印裔穆斯林作家厄巴(M.J. Akbar)的觀察，西方的「下一輪對峙必定來自穆斯林世界，為世界新秩序而展開的鬥爭將從馬格里布到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國家內展開」。而西方的盧易思(Bernard Lewis)亦有類似結論②：

我們現在面對的氣氛和發展，遠超過政府及其擬訂的議題和政策。它們確然是文明的衝突——衝突的產生是由於歷史上的敵人針對我們猶太—基督宗教傳統、我們世俗化的現狀，以及對此二者在全球擴張而作出可能是

石油輸出國及許多阿拉伯國家已達到一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獨裁政府的形式已不合時宜，引介民主政治的努力則愈形殷切。阿拉伯政治制度的空場已然出現。但在阿拉伯世界裏，西方式民主反而強化了反西方的政治力量。

非理性的反應；不過這種反應在歷史上屢見不鮮。

阿拉伯伊斯蘭文明的另一巨大敵對反應，一向是針對南部黑人民族。他們是異教徒、萬物有靈論者，如今卻日漸基督教化。這種敵視態度過去反映在阿拉伯奴隸販子與黑奴的形象中。最近則反映在蘇丹境內阿拉伯人與黑人持續進行的內戰，利比亞支持的叛亂分子與政府在乍得的戰鬥，非洲南端東正教基督徒與回教徒的緊張，奈及利亞回教徒與基督徒間的政治衝突，不斷重覆的暴亂以及城鎮的暴行等等。非洲現代化與基督宗教的傳播，很可能沿此斷層線增強了暴虐的可能性。1993年2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喀土穆發表演說，抨擊蘇丹回教徒政府對少數基督徒的種種作法，已顯示出衝突深化。

在伊斯蘭北部邊界，東正教與穆斯林民族的衝突日趨惡化，其中包括波斯尼亞與撒拉熱窩的屠殺，塞爾維亞與阿爾巴尼亞之間的瘋狂殘殺，保加利亞人與少數土耳其人的脆弱關係，奧塞特人與印古什人彼此的暴力行為，阿美尼亞人與阿塞拜疆人不斷相互傾軋，俄羅斯與中亞回教徒的緊張關係，以及俄羅斯為保護其利益而把軍隊部署在高加索及中亞。宗教加強了種族認同的復興，並再次激起俄羅斯對南部邊境安全的疑懼。關於這種顧慮，羅斯福(Archie Roosevelt)是頗能知其底蘊的^③：

斯拉夫民族與土耳其民族的邊境鬥爭，幾乎佔了大半俄羅斯歷史。這些鬥爭，可回溯至千多年前俄羅斯立國之時。斯拉夫與東方鄰國對抗的漫長歷史，不單暗藏着理解俄羅斯歷史的鎖鑰，亦是掌握其民族性格的訣竅。要瞭解俄羅斯今日的真實境況，就不能忽略長期以來成為俄羅斯人心理負擔的土耳其民族。

亞洲其他地區的文明衝突也是久遠的。穆斯林與印度教在次大陸的歷史齟齬，現在不單顯現在巴基斯坦跟印度的對抗，亦反映於印度境內日漸好戰的印度教團體與堅實的少數回教徒之間緊張的宗教鬥爭。1992年12月阿約提亞清真寺被毀揭示的問題是：印度是否仍是一個世俗的民主國家，抑或變成一個印度教國家？在東亞，中國與鄰邦仍有許多待決的邊境糾紛。中國對西藏佛教民族與穆斯林突厥民族施行嚴苛的政策。冷戰結束後，中國大陸與美國間的分歧再次見於人權、貿易及武器擴散等領域，而這些分歧似乎不能緩和。據鄧小平在1990年宣稱，中國大陸與美國正進行一場「新的冷戰」。

同樣的詞彙亦被用於日本與美國間愈形嚴峻的關係上。於此，文化的差異加重了經濟的衝突。雙方人民都宣稱對方是種族主義者，但至少就美國來說，嫌惡的非關種族而是文化。兩個社會的基本價值、態度、行為模式幾乎南轅北轍。美國與歐洲的經濟問題的嚴重性絕不遜於美國與日本之間的，可是它們之間卻沒有相同的政治磨擦及情緒上的緊張，這是由於美國文化與歐洲文化的差異遠少於美國與日本。

冷戰結束後，中國大陸與美國間的分歧再次見於人權、貿易及武器擴散等領域，而這些分歧似乎不能緩和。鄧小平宣稱，中國大陸與美國正進行一場「新的冷戰」。

文明間的關係就其具有暴力特徵的可能程度上，存在的差異甚大。經濟競爭明顯支配着屬於西方的美國及歐洲子文明，亦支配着西方與日本之間的關係。但是，在歐亞大陸，種族衝突的產生並非全屬偶然（種族衝突有時以「種族清洗」形式出現）。在分屬不同文明的團體間，種族衝突是極為頻仍與暴力的。在歐亞大陸，文明間巨大的歷史斷層線再次熾燃。這狀況對自非洲東北角到中亞所形成的半月形伊斯蘭國家集團的邊界來說，尤為真實。回教徒亦與巴爾干半島塞爾維亞東正教徒、以色列的猶太人、印度的印度教徒、緬甸的佛教徒及菲律賓的天主教徒，發生暴力衝突。伊斯蘭的邊界是用血築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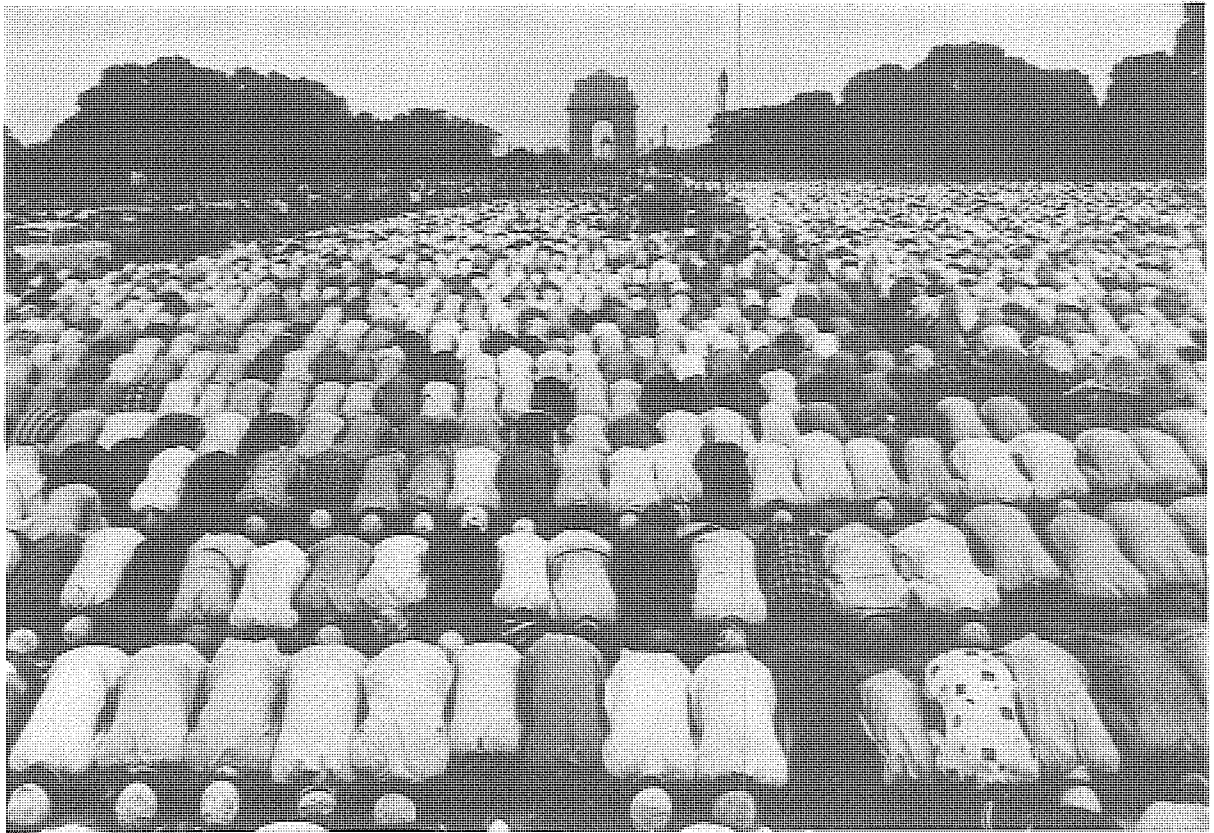
文明結合：親族國家的併發症候

相同文明的不同集團或國家與異質文明發生戰爭時，很自然會凝聚一起相互支援。正如冷戰後世界所揭櫫的：文明的共通性——葛連咸(H.D.S. Greenway)稱為親族國家的併發症候(kin-country syndrome)——取代政治意識形態與傳統勢力平衡的考量，成為合作與結盟的首要基礎。這可從冷戰後的波斯灣戰爭、高加索與波斯尼亞日漸升級的衝突得到印證。雖然它們不完全是文明間的全面戰爭，但各自都包含着文明聚合的因素。每當衝突持續，這些因素的重要性便愈加突出，我們更可從中預感未來的情況。

首先，海灣戰爭是由一個阿拉伯國家侵略另一個阿拉伯國家而引發的，然後是一個阿拉伯國家對抗由阿拉伯、西方及其他國家組成的聯盟。期間只有少數穆斯林政府公開支持侯賽因，然而許多阿拉伯精英私下予以聲援，他亦極受阿拉伯民眾擁戴。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支持伊拉克，甚於支持由西方撐腰的科威特與沙烏地阿拉伯政府。侯賽因放棄阿拉伯民族主義，公開向伊斯蘭教徒作出訴求。他及其支持者意圖把這場戰爭定位為文明間的戰爭。麥加烏姆古拉大學伊斯蘭研究院院長夏華禮(Safar Al-Hawali)在一廣泛流傳的錄音帶中提到：「這不是世界跟伊拉克的對抗，而是西方與伊斯蘭的對抗。」伊朗捐棄了跟伊拉克的嫌隙，其最高宗教領袖霍梅尼(Ayatollah Ali Khamenei)向西方發動聖戰：「與美國的侵略、貪婪、計劃與政策所進行的鬥爭，應視為穆斯林的聖戰，任何人為此犧牲，他便是個殉道者。」約旦國王胡辛認為：「這不單是反伊拉克的戰爭，亦是反對所有阿拉伯國家與穆斯林信仰的戰爭。」

阿拉伯堅實的精英階層與侯賽因背後的群眾結合，使那些反伊拉克聯盟的阿拉伯政府在行動上有所節制，亦緩和他們的公開言論。阿拉伯諸國政府或是反對西方向伊拉克施加的種種壓力（包括1992年夏天強制的飛行禁區及1993年元月轟炸伊拉克），或是與之保持距離。1990年的西方—蘇維埃—土耳其—阿拉伯的反伊拉克聯盟，到了1993年變成幾乎只有西方與科威特的反伊拉克結盟了。回教徒將西方鎮壓伊拉克及無力保護波斯尼亞人反抗塞爾維亞人的行動，和西方對以色列違反聯合國決議而無法對之作出制裁等事件兩相對照，他們宣

文明相左的世界無可避免是雙重標準的：對親族國家使用一種標準，而對其他國家則使用另一種標準。



稱西方在使用雙重標準。可是，文明相左的世界無可避免是雙重標準的：對親族國家使用一種標準，而對其他國家則使用另一種標準。

第二，親族國家併發症候亦在前蘇聯的衝突中出現。1992及1993年，阿美尼亞的軍事勝利，增強了土耳其對同信仰、種族、語言的阿塞拜疆兄弟的支持，1992年一位土耳其官員談到：「我們土耳其民族感受到阿塞拜疆人同樣的情感。我們正承受着壓力，報章上充斥着殘暴的相片，並質問我們是否仍嚴正奉行中立政策。我們或許應讓阿美尼亞人知道，在本區域內仍有強大的土耳其。」阿齊爾總統同意並指出，土耳其應向「阿美尼亞人施點下馬威」。1993年他再次恐嚇說土耳其將會「顯露其毒齒」。土耳其戰機強行在阿美尼亞偵察，並斷絕阿美尼亞的食物船運及對外航空。土耳其與伊朗宣稱，他們無法忍受阿塞拜疆的分裂。蘇聯政府對阿塞拜疆的支援，是因為其政府由前共產黨員所控制。可是，隨着蘇維埃聯邦告終，政治上的考量便讓位於宗教的考量了。俄羅斯軍隊站在阿美尼亞的一邊，阿塞拜疆便指責「俄羅斯政府一百八十度轉向」支持信奉基督的阿美尼亞。

第三，關於前南斯拉夫的戰鬥，西方民眾普遍對波斯尼亞回教徒及他們因塞爾維亞人的恐怖行為而受的痛苦表示同情和支持，但相比之下，他們對克羅地亞人襲擊回教徒並參予瓜分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的事情，卻較少關注。德國在南斯拉夫分裂初期，不尋常地展示外交的熱切與力量，勸使歐洲共同體其他十一個成員國共同承認斯洛伐尼亞及克羅地亞。由於教宗決定對兩個天主教國

文明的共同性已成為聚攏不同族群的首要力量。

家提供強大支持，梵帝岡比歐共體更早承認這兩個國家。美國緊步歐洲的後塵。因此，西方文明中佔重要地位的成素在斯洛伐尼亞、克羅地亞等具有共同信仰的國家內結合起來。據說克羅地亞後來從中歐及其他西方國家獲取大量軍械。另一方面，葉爾欽政府嘗試採取中間路線，使俄羅斯既可對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表示同情，又不致與西方疏遠。可是，擁有許多議員的俄羅斯保守派與民族主義集團，抨擊政府為何不對塞爾維亞人提供更多援助。1993年初，幾百個俄羅斯人明顯服役於塞爾維亞軍隊，新聞更傳言俄羅斯向塞爾維亞人提供軍備。

另一方面，伊斯蘭政府及集團申斥西方沒有保衛波斯尼亞人。伊朗領袖號召所有國家的回教徒援助波斯尼亞；伊朗違反聯合國部隊禁運令，為波斯尼亞供應武器與人員；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組織更遣送游擊隊協助波斯尼亞訓練及組織軍隊。1993年，據說來自超過二十四個回教國家的四千回教徒在波斯尼亞參戰。沙烏地阿拉伯及其他國家的政府正承受境內原教旨主義團體愈來愈大的壓力，被要求對波斯尼亞人提供強力支援。1992年底，據說沙烏地阿拉伯為波斯尼亞人提供巨額購買武器專款及各種援助，這無疑增強對抗塞爾維亞人的能力。

1930年代，西班牙內戰引起奉行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及民主主義等國家的干預。1990年代，南斯拉夫的衝突則招來回教國家、東正教國家及西方基督宗教國家的干預。此二者的相類性並沒有被忽略。一位沙烏地編輯評論：「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的戰爭可與西班牙內戰對抗法西斯主義相比，那些為拯救同伴而戰死沙場的人被奉為殉道者。」

衝突與暴力亦會發生在相同文明的國家與團體內。但這些衝突跟相異文明間的衝突相比要來得緩和，亦較不易擴大。由於它們隸屬於相同的文明，因而減低了釀成暴力的可能性。1991年及1992年，許多人因俄羅斯與烏克蘭就領土（特別是克里米亞半島）、黑海艦隊、核武器及經濟等問題可能生發的暴力衝突而感到驚恐。但是，如果文明的因素真是具有影響力的話，那麼暴力在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之間發生的可能性應是很低的。兩者同屬斯拉夫且以東正教徒為主的民族，有着長久而深厚的情誼。就以1993年初為例，儘管有許多衝突的理由，兩國領袖仍能迅速協商並調解雙方的問題。當前蘇聯境內的回教徒與基督徒發生嚴重戰鬥、波羅的海諸國的西方基督徒與東正教徒之間瀰漫着緊張與格鬥之時，而俄羅斯與烏克蘭實際上並無發生任何暴力衝突。

文明的結合迄今是有限的，可它正在滋長且明顯有進一步擴延的態勢。當波斯灣、高加索及波斯尼亞衝突持續的時候，民族的地位和它們之間的日趨分裂，都是生發在文明線上的。民粹主義的政客、宗教領袖及傳播媒介都發現：文明是動員大眾支持及對軟弱政府施壓的有力手段。未來數年間，世界的地區性衝突之中，波斯尼亞和高加索的地區性衝突是發生在文明間的斷層線上的，最可能升級為主要的戰爭。這些戰事皆源於文明的斷層線。如果真有下一次世界大戰，它將是文明之戰。

未來數年間，世界的地區性衝突之中，波斯尼亞和高加索的地區性衝突是發生在文明間的斷層線上的，最可能升級為主要的戰爭。如果真有下一次世界大戰，它將是文明之戰。

西方對抗非西方

較諸其他文明，西方現正處於非常的權力高峰，它的超強對手已從地圖上消失。西方國家之間的軍事衝突匪夷所思，其軍事力量無可匹敵。除了日本，西方再沒有經濟的對手。西方支配了國際的政治組織與安全體系，並與日本共同支配着國際經濟組織。由美國、英國與法國共同組成的理事會有效地為全球的政治及安全問題定調，而美國、德國與日本組成的理事會則決定世界的經濟問題，這些國家彼此維繫緊密的關係，而把非西方國家排除於外。聯合國安理會或國際貨幣基金會所作的決定實際上反映着西方的利益，但卻假借代表世界整體(world community)願望的面目出現。「世界整體」這個詞彙已經成為委婉的集合名詞(取代了「自由世界」)，它使反映美國與其他西方勢力利益的行動獲得普遍的合法性^④。西方透過國際貨幣基金會及其他經濟組織推展其經濟利益，並將它認為合適的經濟政策強加給別的國家。在非西方國家的公民投票中，國際貨幣基金會無疑會贏得財政部長與少數人的支持，但其他人則只會給予一面倒的負面評價。後者都會同意亞巴托夫(Georgy Arbatov)把國際貨幣基金會描述為「喜歡奪取別人的金錢，愛把經濟上與政治操守上的不民主和相異的規則強加於人，又喜歡壓制經濟自由的新布爾什維克」。

西方在聯合國安理會及其所做的決定中佔了絕對的優勢(偶爾因中國投棄權票而稍為收斂)，令其獲得聯合國賦予的合法性，去使用武力把伊拉克驅離科威特，並摧毀伊拉克的精密武器及生產這類武器的能力。西方的絕對優勢亦促使美國、英國及法國作出史無前例的行動，促請安理會要求利比亞交出泛美103客機爆炸案的疑犯，而且在利比亞拒絕之後加以制裁。西方擊潰龐大的阿拉伯軍隊後，毫不猶豫地把勢力盤據在阿拉伯世界。西方正利用國際組織、軍事力量及經濟資源等方式來主宰世界，由此而維持其優勢、保障其利益及宣揚其政治及經濟價值。

至少，這是非西方人看到新世界的途徑，並且他們的觀點包含着真理成分。勢力的差異及軍事、經濟與制度等力量的競逐，成為西方與其他文明衝突的來源之一。文化的差異，即價值與信仰的差異，是衝突的第二個來源。賴波爾(V.S. Naipaul)論說：西方文明是「切合所有人的普世文明」。就表面來說，西方文化事實上已有許多方面滲入整個世界。可是從根本來說，西方的觀念與其他文明中的主要觀念仍有分歧。西方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立憲制度、人權、平等、自由、法治規章、民主、自由市場、政教分離等觀念，鮮能在回教、儒家、日本教、印度教、佛教或東正教等文化中獲得反響。西方努力傳播這些觀念，換來的卻是對所謂「人權帝國主義」的反抗，並對固有價值的再肯定，這可從非西方文化的年輕一代對宗教原教旨主義的支持中得到印證。可能存在「普世文明」的想法本身就是西方的觀念，顯然跟大多數亞洲社會的殊別論(particularism)，並與他們所強調的區別各個民族的要素並不相合。確實，一項就價值問題，在不同社會所作的一百個比較研究有如下結論：「在西方最重

聯合國安理會或國際貨幣基金會所作的決定實際上反映着西方的利益，但卻假借代表世界整體願望的面目出現。「世界整體」這個詞彙已經成為委婉的集合名詞，它使反映美國與其他西方勢力利益的行動獲得普遍的合法性。

勢力的差異及軍事、經濟與制度等力量的競逐，是西方與其他文明衝突的來源之一。文化的差異，即價值與信仰的差異，是衝突的第二個來源。

要的價值，在全世界卻並非那麼重要。」^⑤當然，在美國與其他西方勢力努力勸誘別的國家採納民主及人權觀念時，這些分歧在政治領域中表現得尤其明顯。現代民主政府創設於西方，當它在非西方社會發展時，通常是西方殖民主義或西方強加的產物。

用馬布班尼(Kishore Mahbubani)的詞彙來說，未來世界政治的主軸很可能是「西方與非西方」的矛盾，以及非西方文明對西方的強權與價值的回應^⑥。這些回應一般是以三種形式之一、或是三者相互組合的方式出現。其中一種極端的方式是，非西方國家可能採取隔離路線，像緬甸與北韓的例子，把自己的社會從西方的滲透或「墜落」中分隔出來，拒絕參與由西方主導的國際社會。可是，這條路線的代價是昂貴的，而且很少國家能夠貫徹到底。第二種選擇相當於國際關係中的隨大流理論，就是嘗試加入西方並接納其價值與制度。第三個選擇則是透過發展經濟與軍事力量，並與其他非西方社會一起對抗西方，從而取得與之「平衡」的地位，與此同時亦保存固有的價值及制度。簡言之，就是現代化而不西化。

精神分裂的國家

在未來，由於人們藉文明而區分開來，擁有眾多民族且隸屬不同文明的國家(如前蘇聯及南斯拉夫)將潛在分裂的危機。其他某些國家本身具有相當程度的文化同質性，但就自己的社會該屬那一種文明卻未有一致的共識。這些是精神分裂的國家。其領袖很想追隨大流，成為西方陣營的一員，但其歷史、文化與傳統都是非西方的。土耳其是最明顯與最具代表性的精神分裂國家。二十世紀後期的土耳其領袖追隨希臘化的土耳其傳統，並視土耳其為現代的、世俗的西方國家。土耳其與西方國家在北約組織及海灣戰爭中結盟，亦申請進入歐洲共同體。但與此同時，土耳其社會的部分成員卻支持伊斯蘭復興，並指出土耳其基本上是中東的穆斯林社會。除此以外，當土耳其精英把土耳其定位為西方社會時，西方精英卻排斥它。土耳其將不會成為歐共體的一員，其真正的理由，如阿齊爾總統所說：「是因為我們是回教徒，他們是基督徒，只不過他們沒有明說而已。」拒絕了麥加，然後被布魯塞爾排斥，土耳其何處安身呢？塔什干可能是個解答。蘇聯瓦解使土耳其有機會成為從希臘邊境到中國邊境七個屬於土耳其文明國家的領袖，由於西方的刺激，土耳其正極力為自己塑造一個新的身分。

在過去十年，墨西哥某些情況與土耳其相似。就如土耳其放棄歷史上與歐洲對抗的態度並嘗試溶入其中那樣，墨西哥不再以對抗美國來定位自己，代之以仿效美國並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墨西哥領袖正致力給自己國家定位的艱巨任務，並引入會導致政治轉變的基礎性經濟改革。1991年，莎蓮娜絲(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總統的高級顧問曾對我縷析莎蓮娜絲政府的連串變革。當

他講完後，我說：「這是非常吸引人的。就我看來，你們基本上希望把墨西哥從一個拉丁美洲國家轉變為一個北美國家。」他以訝異的目光看着我，並大聲說：「完全正確！這正是我們全力以赴的，但當然，我們絕不能明說出來。」他所說的表明了墨西哥跟土耳其的情形一樣，社會中有的重要成員在抗拒國家認同的重新定位。在土耳其，傾向歐洲的領袖向伊斯蘭示好（阿齊爾到麥加朝聖）；而傾向北美的墨西哥領袖亦同樣向那些視他們為拉丁美洲國家的其他國家示好（莎蓮娜絲參與在瓜達拉哈拉召開的西裔美洲高峰會議）。

歷史上，土耳其一向是精神分裂最深的國家。對美國來說，墨西哥是地理上最接近的精神分裂國家。全球來說，俄羅斯是最重要的精神分裂國家。俄羅斯到底是西方的一部分，抑或是獨特的斯拉夫—東正教文明的領袖？這樣的問題不斷在俄羅斯歷史中重覆。共產黨在俄國獲得勝利，輸入了西方的意識形態，並使之切合俄羅斯的情勢，然後打着那些意識形態旗幟來挑戰西方，從而使定位的問題變得模糊。共產主義的得勢打斷了有關西化抑或俄羅斯化的歷史爭議，但隨着共產主義信仰破產，俄羅斯人得再次面對這個問題。

葉爾欽總統採納西方的原則及目標，試圖令俄羅斯成為一「正常」的國家並成為西方的一部分。到目前為止，俄羅斯精英與民眾對此問題存在着分歧。在較溫和的異議分子當中，史坦卡維奇(Sergei Stankevich)主張俄羅斯應拒絕「大西洋」路線，因它將使俄羅斯「變為歐洲國家，以急速與有組織的方式成為世界經濟的一部分，成為歐洲七國的第八個成員國，也就更突出了德國及美國在大西洋聯盟的統治性地位。」史坦卡維奇雖反對完全的歐亞政策，但他仍指出俄羅斯應該優先保護其他國家裏的俄羅斯人，另一方面又強調它跟土耳其及穆斯林的關係，並提倡「在有利於亞洲和東方的情形下，把資源、選擇、關係和利益適當地重新分配」。持這種信念的人批評葉爾欽把俄羅斯的利益置於西方國家的利益之下，削減了俄羅斯的軍事力量，沒能支持塞爾維亞等老朋友，並用傷害俄羅斯民眾的方式推行經濟與政治改革。沙維斯基(Peter Savitskey)思想的普及正正顯示了這個趨勢，他在1920年代已主張俄羅斯乃一獨特的歐亞文明^⑦。愈激進的異議者，其主張就愈具有囂悍的民族主義、反西方及反閃族的色彩，這催使俄羅斯再次擴展軍事力量，並跟中國及穆斯林國家建立更為緊密的聯繫。俄羅斯民眾與精英分子無異，亦存在着意見的分歧。1992年春天，一項在俄羅斯歐洲部分的意見調查顯示，40%民眾對西方採取肯定態度，而36%則持否定態度。正如俄羅斯大部分歷史處境，它在1990年初真的是一個精神分裂國家。

精神分裂國家需要重新界定其文明身分，必須滿足三個條件：第一，其政治及經濟精英一般對此運動表示支持與熱衷；第二，其人民要有接受再定位的意願；第三，它意欲投身的文明內的主導集團必須願意接納它的加入。這三項要求大都存在於墨西哥，而前兩項則見諸土耳其。關於俄羅斯加入西方，這三個條件存在與否並不清晰。自由的民主政體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矛盾是意識形態的矛盾——撤除主要分歧，表面上它們都有相同的自由、平等及繁

精神分裂國家需要重新界定其文明身分，必須滿足三個條件：第一，其政治及經濟精英一般對此運動表示支持與熱衷；第二，其人民要有接受再定位的意願；第三，它意欲投身的文明內的主導集團必須願意接納它的加入。

榮終極目標。傳統、獨裁、民族主義的俄羅斯也許有着極為不同的目標。西方民主主義者與蘇聯馬克思主義者可以展開一場知性的論辯，但跟俄羅斯的傳統主義者卻行不通。如果當俄羅斯人放棄馬克思主義者的行為方式時，他們拒絕自由民主政體，並開始依俄羅斯人而不依西方人的行為模式，那麼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將再次變得疏遠及矛盾^②。

儒家—伊斯蘭的聯合

非西方國家加入西方所受的阻力各有不同。回教、儒家、印度教和佛教社會遭受的阻力較大，前蘇聯的東正教國家較次，而拉丁美洲和東歐國家則最小。日本作為西方非正式的成員，已建立起獨特地位，它的某些方面屬於西方，但在重要層面上卻不然。那些因為文化與能力的緣故而不想或不能加入西方的國家，藉着發展本身的經濟、軍事及政治力量與西方競爭。它們透過推動內部發展或與其他非西方國家合作來達到這個目標。這種合作最突出的形式是儒家—伊斯蘭的連結，它的出現是要挑戰西方的利益、價值與勢力。

西方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地裁減軍事力量，葉爾欽領導的俄羅斯亦然。可是，中國、北韓及幾個中東國家卻有意擴張軍事實力。為達此目的，它們從西方與非西方管道輸入武器，並發展本土的軍事工業。其一後果是高譚馬(Charles Krauthammer)指稱的「武器國家」的出現，而這些武器國家並非西方國家。另一個結果則是武器管制的重新規定，它是西方的概念與目標。冷戰期間，武器管制的主要目標是想在美國及其同盟國與蘇聯及其同盟國之間，建立穩定的軍事平衡。冷戰後的世界，武器管制的首要目標則是杜絕非西方社會之軍事能力發展會威脅到西方利益的可能性。西方嘗試透過國際協議、經濟壓力、軍事與武器技術轉移的控制來達到此目的。

西方與儒家—伊斯蘭國家的衝突，大多(雖不是全部)集中於核子、化學及生物武器、彈導飛彈與運送武器的精密方法，和達到此目的的指引、信息與其他電子技術能力等方面。西方倡議非擴散為普遍規範，而非擴散條約及監察則是實現此規範的手段。它亦用於懲罰恐嚇那些推動擴展尖端武器的其他國家，而對不擴展的國家則施予小利。西方的關注點很自然落在那些事實上或有可能敵視西方的國家上。

另一方面，非西方國家堅持有權取得和配置自己認為在國防上有需要的武器。他們亦充分汲取了印度國防部長從海灣戰爭所得的教訓：「除非你擁有核武器，不然不要與美國作戰。」核武器、化學武器及飛彈被視為(很可能是錯誤的)足以與西方較強勢的軍力相抗衡。中國當然早已擁有核武器，巴基斯坦與印度亦具備配置的能力。北韓、伊朗、伊拉克、利比亞和阿爾及利亞則企圖獲得它。一位伊朗高級官員宣稱，所有穆斯林國家應該獲得核武器，而據說伊朗總統在1988年頒佈了一條發展「攻擊性及防衛性的生物、化學與放射性武器」的

冷戰期間，武器管制的主要目標是想在美國及其同盟國與蘇聯及其同盟國之間，建立穩定的軍事平衡。冷戰後的世界，武器管制的首要目標則是杜絕非西方社會之軍事能力發展會威脅到西方利益的可能性。



訓令。

就反西方軍事力量發展來說，最值得留意的是中國軍事力量的持續擴張及產生軍事力量的方法。令人注目的經濟發展標示中國正急遽增加軍事開支，並全力邁向軍隊現代化。它從前蘇聯購買武器，發展長程飛彈，1992年試驗一項百萬噸的核子裝置，亦正在發展發射火箭的能力，取得空中加油技術，並嘗試購買航空母艦。其軍事的逐步建立，並宣稱擁有南中國海主權，在東亞正掀起一場多邊的區域軍事競賽。中國同時也是軍事及武器技術的主要輸出國。它把能用作製造核武器及神經毒氣的材料運往利比亞與伊拉克，亦協助阿爾及利亞建立適合核武研究及生產的反應堆。中國售賣核子科技給伊朗，而美國官方認為這些技術只能被用作製造武器，它更明目張膽地將300里射程的導彈組件用船運往巴基斯坦。北韓亦進行了一段時間的核武計劃，並向敘利亞和伊朗售賣先進導彈與技術。武器及武器技術一般是從東亞流向中東。但是，此間有些行動是以相反方向進行：中國從巴基斯坦獲取毒刺飛彈。

因而，儒家—伊斯蘭的軍事結合已經形成，這結合立意藉由成員之間獲得所需的武器和技術，以與西方的軍事力量抗衡。現在還不能判斷，這種結合會不會持久。但是，如麥卡迪(Dave MaCurdy)所說，如今它是「由擴張者及其支持者所操控的一個相互支持的反叛聯盟」。新的軍事競逐形式正在伊斯蘭—儒家國家與西方之間產生。固有的軍事競逐方式是雙方各自發展自己的軍事力量，用以平衡或壓倒對方。而在新的軍事角逐形式裏，情況將是一方雖發展其

儒家國家與伊斯蘭社會將是西方下一輪的打擊對象。

軍事力量，但另一方卻不在意平衡與否的問題，而是限制並預防對方逐步建立的軍事力量，與此同時則削減自己的軍事能力。

對西方的啟示

我們並不是要證明文明的認同會取代其他認同，亦非要指出民族國家行將消失，也不是想說每種文化都會變成單一而一致的政治實體，或是在隸屬同文明的種族之間不會有衝突甚至爭鬥。本文旨在提出一些看法：文明差異確實明顯存在，而且文明意識正與日俱增；文明間的衝突將會取代意識形態與其他形式的衝突而成為世界上最主要的衝突形式。國際關係——這個一向在西方文明內把玩的遊戲——將日趨非西方化，非西方文明不再是配角而會成為這個遊戲的主角。成功的國際政治、國防和經濟制度的發展，多會在同文明而較少在跨文明間發生。異文明的種族衝突增多，且比同文明的種族衝突更持久和暴力；異文明間的種族暴力衝突的逐步升級最危險，也最可能成為導致世界大戰的原因。「西方與非西方」的關係將會是世界政治最重要的軸心。一些精神分裂的非西方國家的精英分子會試圖把國家變成西方的一員，但他們在貫徹這個目標時多會遭遇困難。在可見的將來，衝突的焦點將發生在西方與幾個伊斯蘭—儒家國家之間。

在可見的將來，不會有普世的文明，有的只是一個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而其中的每一個文明都得學習與其他文明共存。

我們並不認為文明衝突是好事，只是探討將來可能出現的種種情況而已。倘若這些看法具有說服力，那麼，就必須考慮它們與西方政策的關係。這些啟示應從短期利益和長期調適兩方面來看。很明顯，就短期來說，西方促進本身文明內尤其是歐洲和北美子文明之間的進一步合作與團結，將文化與西方接近的東歐和拉丁美洲社會融入西方；促進並維繫跟俄羅斯和日本的合作關係；避免把地區性文明間的衝突逐步升級為異文明間的主要戰爭；抑制伊斯蘭與儒家國家的軍事擴張；放緩削減西方軍事力量的步伐，並保持西方在東亞與西南亞國家的軍事優勢；製造儒家與伊斯蘭國家之間的差異與衝突；支持與西方價值和利益相投的其他文明族群；鞏固能夠反映西方利益與價值並使之合法化的國際組織，並且推動非西方國家參與這些組織。以上種種作為，皆符合西方利益。

從長遠來說，則需要看到其他方面。西方文明既是西方的亦是現代的。非西方文化試圖取後者而捨前者。至今只有日本能夠成功。非西方文明將繼續追求財富、科技、技術、機械和武器，這些都是現代的一部分。他們更會調和這些現代事物和傳統文化價值。相對於西方國家而言，他們的經濟、軍事力量會增加。因此，西方國家便更需要適應這些實力跟自己接近，而文化利益卻迥然相異的現代非西方文明。這樣，西方國家便得維持必要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以保護在與非西方文化國家的關係中的自身利益。然而，西方國家也需要深入瞭解其他文明的基本宗教和哲學主張，以及洞悉他們是如何理解自身利益的。這

需要西方致力去識別和其他文明間的共通性。在可見的將來，不會有普世的文明，有的只是一個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而其中的每一個文明都得學習與其他文明共存。

註釋

- ① Murray Weidenbaum: *Greater China: The Next Economic Superpower?* St. Louis: Washington Universit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Business, Contemporary Issues, Series 57 (February 1993), pp. 2–3.
- ② Bernard Lewis: “The Roots of Muslim Rage,”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 266 (September 1990), p. 60; *Time* (June 15, 1992), pp. 24–28.
- ③ Archie Roosevelt: *For Lust of Knowi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88), pp. 332–33.
- ④ 幾乎所有西方領袖都聲稱自己的行動是代表「世界整體」的。其中一個小失誤發生在海灣戰爭正熾熱的時候。1990年12月21日「早安美國」的訪問中，英國首相馬卓安把軍事行動說成是西方對抗侯賽恩的行動。他馬上把「西方」矯正為「世界整體」。然而，當他失言的時候，所表達的卻是事實。
- ⑤ Harry C. Triandis: *The New York Times* (Dec. 25, 1990), p. 41, and “Cross-Cultural Studie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vol. 37 (1989), pp. 41–133.
- ⑥ Kishore Mahbubani: “The West and the Rest”,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92), pp. 3–13.
- ⑦ Sergei Stankevich: “Russia in Search of Itself,”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92), pp. 47–51; Daniel Schneider: “A Russian Movement Rejects Western Til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5, 1993), pp. 5–7.
- ⑧ 夏里士(Owen Harries)指出，澳洲正相反地設法成為精神分裂國家。雖然澳洲是西方國家的一員，亦是美英加澳的軍事和情報中心，但現在的領導人事實上正計劃把她脫離西方，將之重新定為亞洲國家，並增進與友鄰的緊密聯繫。他們認為，澳洲的前途與東亞熱絡的經濟是休戚相關的。但是，我已經指出，緊密的經濟合作有賴共同的文化基礎。此外，精神分裂國家加入另一文明所須具備的三個條件，在澳洲都不大可能存在。

by Samuel Huntington © Foreign Affairs/NYT Syndicate

余國良 譯

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1927–) 美國當代政治發展理論權威，自50年代起，即在哈佛大學任教，目前為該校伊頓講座教授，以及奧連戰略研究所(John M. Oli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所長。同時，除學術工作外，亦積極參與各種有關軍事、外交、政治之政府顧問工作。亨氏著述甚豐，涉及範圍甚廣泛，其中包括*Political Power: USA/USSR* (1964),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y* (1968), *No Easy Choic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1976), *American Politics: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 (198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1991)等多種，影響深遠。其中尤以他所提權威(Authority)對現代政治重要性的論點最受注意。本文是作者在哈佛大學奧連研究所就「轉變中的防禦環境及美國的國家利益」專題研究提交的報告。